

论苏轼在杭州时期的文化性格

周晓音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文法系, 浙江 杭州 310012)

摘要:苏轼两度来杭均因政治原因外放做官,处于人生的失意时期。但他坚持为百姓做事,以实际行动来完善自身的道德修养,实现其政治理想;苏轼生活积极、快乐,他观览山水、吟诵诗词、结交僧侣,与杭州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形成了最好的融汇状态。这种生机浩荡、天趣洋溢、超然旷观、自足完满的人生境界,是对儒家思想的坚持,又是对佛道思想的吸收。入世之志意与超旷之襟怀,构成了苏轼人生的一体两翼,传达了他对个体生命的真正重视,为我们树立了可供仿效的文化性格。

关键词:苏轼;杭州;超旷;儒释道;文化性格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035(2010)04-0022-06

“居杭积五岁,自意本杭人”(《送襄阳从事李友谅归钱塘》)。熙宁四年,苏轼任杭州通判(副知州);元祐四年,又以龙图阁大学士的身份出任杭州太守,在杭州先后达五年之久。苏轼两度来杭,都是由于政治原因请求外任,是他人生的失意时期;但其处世立身,展示了他的淑世精神和超旷情怀,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士子对人生深邃精微的思考;他出处进退,表现出对个体生命的真正重视,形成了悦乐生活的独特品质和风貌。可以说,苏轼留给杭州的不仅是作为地方长官的政绩和作为文人的诗词与传说,更多的是可供仿效的人文精神和可供思索的文化意义。

一、实现济世安民的政治理想

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追求就是“兼济天下”,成就立德、立功、立言的三达德。作为一位士人,苏轼有着经世济时的远大抱负,事功之心执著而坚定,希望通过立功立言来成就道德;作为一个有着充盈的内在精神理想的人,苏轼的人生态度是积极的,他总是快乐地履行职责,拥抱生活。

从走出眉山踏上仕途的那天起,苏轼选择了政治,也就必然要去完成社会的责任和义务。苏轼第一次来杭州,是在与王安石变法的矛盾中感到世事艰难,“眼看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初到杭州寄子由》),选择补外,来到杭州任通判;第二次是在元祐党争的困苦中请求外任。“恋禄”固然是外任的一个原因,但更多的还是为了能够有所成就。“他企图远离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旋涡,一则避开是非,保全自己,二则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以践初衷。”^{[1] 282}因此,苏轼仕杭时期并没有消极地对待生活,尽管由于失意有时也难免流露悲凉的情绪,但积极入世精神仍是主导。可以说,“民本思想”植入了苏轼的心灵。他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尽管离开朝廷,但只要仍然能够有所作为,实践致君尧舜的人生理想,他都会感到安慰和快乐。作为杭州的地方官,苏轼用世之意表现在关注百姓的生存、踏踏实实地为百姓做事上,而乐亦在其中。

1. 在办理讼事中流露仁义之心。苏轼第一次到杭州任通判,职务相当于今天一个助理官员,没有权力为百姓办大事,但他仍然体察百姓,关心着

*收稿日期: 2010-03-02

作者简介:周晓音(1961—)女,浙江金华人,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文法系副教授。

人民的不幸。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苏轼除夜值班于都厅,写下了“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的诗句。他知道新法严苛,被捕的大多是违法的小民,为了活命铤而走险;苏轼将心比心,表达了对“罪囚”的同情。元祐六年三月,苏轼自杭州回京取道湖州至苏州,一路上水患灾情触目惊心。他将在浙西数州看到的灾情上书皇帝,并请求政府立即给予赈灾救济,字行间显示出对百姓灾情的切身体验与深刻同情。^[2]《宋史》本传载:“时新政日下,轼于其间每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安。”相传张小二因天凉多雨扇子卖不出去,欠债未还而被告官,苏轼便援手相助,为其“画扇”以偿清债务。一位理应“铁心冷面”的法官,却仁义敦厚,有着温热的心肠,办案时超越了履行公务的职责;因为只有这样,苏轼的内心才会安宁。

2 在兴修水利的劳苦中体会快乐。熙宁六年(1073)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他积极协助陈襄太守,考察唐代李泌所凿的六井。为了不使之继续干涸,苏轼对井进行了浚修,使钱塘百姓免于干旱之灾。

元祐四年(1089)为了不使茅山、盐桥二河三五年就沙泥复积,出守杭州的苏轼致力疏浚,建立水闸,治理了这个“市井大患”。

元祐五年(1090)始,苏轼专心致志于西湖的治理。他看到西湖因大量泥沙流入,湖床升高,积葑约百公顷,就组织人力调查踏勘,并于次年四月向哲宗皇帝上了《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的奏议,认为“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从养鱼、饮水、灌溉、助航、酿酒等方面列举理由,力陈治湖的必要性。他还在《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中提出具体办法,靠朝廷给他的100道僧人“度牒”换钱,加上救灾余款、以工代赈等,花了20万工疏浚西湖,并用葑草与淤泥筑成一条长堤,还在西湖中建立三座石塔,使西湖多了一道风景。看到西湖得以治理,苏轼得到的是“古岸开青葑,新渠走碧流。会看光满万家楼”(《南歌子》)的满足和陶醉。他在《次韵林子中见寄》中写道:“卷却西湖千顷葑,笑看鱼尾更莘莘。”表达了同样的心境

3 在安民赈灾中坚守地方官的责任。熙宁六

年(1073)秋天,杭州大旱,苏轼带了钱塘县令周邠、仁和县令徐疇到上天竺祷雨。《立秋日祷雨,宿灵隐寺,同周、徐二令》就记录了这次住宿灵隐寺祷雨的经历:深夜不眠,“惟有悯农心尚在”。熙宁七年,浙东发生严重的蝗灾,苏轼亲往临安督促捕捉蝗虫,奔波劳累。元祐四年七月,苏轼第二次来杭,“岁适大旱,饥疫并作”,他立即采取各种赈济措施,大胆上表朝廷,请求豁免杭州上供米三分之一;又“复得赐度僧牒百”,换米以救饥民。元祐五年五、六月,杭州又遭水灾,苏轼给皇太后和朝廷上表,先上“浙西灾伤第一状、第二状”,又上五个“相度准备赈济状”,救百姓于饥馑之中。为此,苏轼后来还遭弹劾,说他“论浙西灾伤不实”。

苏轼一方面救民于饥荒之中,另一方面又积极注意防止瘟疫的感染。他说:“杭,水陆之会,因疫病死比他处常多。”(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为此,他筹措钱款,于元祐五年在杭州城中心众安桥建立医院。周焯《清波杂志》记载:“苏文忠公知杭州,以私帑金五十两助官缙,于城中建病坊一所,名‘安乐’,以僧主之。三年医愈千人,与紫衣。”“安乐坊”成了中国最早的公立医院。

4 在诗歌的美刺中体现人性的光芒。苏轼的诗歌是他生活的记录,我们常能从中看到他对社会的关切。《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描写大雨成灾,“白衣仙人在高堂”的冷漠;《吴中田妇叹(和贾收韵)》写农人遭受雨灾,万苦千辛收获粳稻,却又饱受暴政之苦;《山村五绝》(其三)反映榷盐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岂是闻韵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这位深受儒家仁政学说影响的士大夫,心中装的是百姓,诗歌中也闪烁着人性的光芒。

一个能忧百姓之所忧的仁德之人,才能乐百姓之所乐。苏轼用诗歌指斥时弊,也用诗歌颂美生活。熙宁六年的元宵佳节,苏轼到杭州城北祥符寺观看传统灯会,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纱笼擎烛迎门入,银叶烧香见客邀。金鼎转丹光吐夜,宝珠穿蚁闹连宵。波翻焰里元相激,鱼舞汤中不畏焦。明日酒醒空想像,清吟半逐梦魂销。”(《祥符寺九曲观灯》)闹元宵是太平祥和景象的体现,这一夜彩灯翻舞,百姓欢腾,苏轼也乐在其中。熙宁六年夏日的一天,苏轼与陈襄太守从吴山的有美

堂出来,在月夜里与争看太守威仪的百姓同乐:“共喜使君能鼓乐,万人争看火城还。”(《与述古自有美堂乘月夜归》)诗歌虽然写的是陈襄,但苏轼却以近乎天真的性情记写了当时的景象,欢快之情溢于言表。“嬉游各忘归,阇咽顷未睹。飞球互明灭,激水相吞吐。老去反儿童,归来尚饶鼓”,写的是苏轼于元祐六年元宵节与刚经历过瘟疫灾荒的老百姓欢庆“三五”良宵的情景,他像一个可爱的儿童一样忘情“嬉游”。《于潜令刁同年野翁亭》以生动的诗笔赞美于潜令刁铸政绩清明,为民爱戴。《于潜女》从服饰、劳作、感情着笔:“青裙缟袂于潜女”,“逢郎樵归相媚妩,不信姬妾有齐鲁”,流露出对山间女子的羡慕,令人感到苏轼的淳朴可爱。《新城道中》里有白云、初阳、野桃、竹篱、绿柳、溪水,诗人山行的欢快之情投射在了充满生机的景物当中,西崦人家煮葵烧笋闹春耕的场景更是洋溢着浓浓的喜气。

苏轼两次在杭州为官都是从朝廷流转地方,政治上失意的;但他没有因一己得失耿耿于怀,而是仍然坚守自己的理想和志意,以心系国事、民瘼为己任。作为一个公务在身的地方官,苏轼把勤于政事看作是自己的职守,只要事关百姓的福祉,他都全力投入,孜孜以求的是善治安民,不以物喜,不以己忧,以实际行动来完善自身的道德修养,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荀子指出:“见善修德,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荀子·修身》)苏轼追求的是至仁至善的政治理想,因此,无论出处进退,关怀民生都是他的人生大乐及价值所在。

二、追求愉悦心灵的诗意生活

“文人士大夫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精英群体。他们担当着历史和现实赋予的使命……坚守神圣使命的压力和生之多艰的困扰常令他们在追求现实人生的同时又渴望拥有艺术化的人生。”^[3]苏轼来到杭州,泽被百姓,是杭州人民的幸运;而杭州独特的人文环境、明秀空灵的山水也使他天性中的超旷襟怀遇到了最好的“土壤”,苏轼随性适意的个体生命在这里得到了充分舒展。

1. 赏鉴山水是愉悦精神的需要。“独专山水乐,付与宁非天”(《怀西湖寄晁美叔》)。杭州的

山水是灵秀的,它能抚慰苏轼的心灵,使他陶醉其间,心境疏朗、放达。苏轼踏山、赏湖、观海,大自然的生命力量常常使他忘怀得失。在自然里面,苏轼的心灵得到了休憩,体现出顺应自然、追求与自然和谐的慧性。

苏轼以艺术家的心灵鉴赏山水风物。“天欲雪,去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水清出石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腊日不归对妻孥,名寻道人实自娱”(《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古代腊日有家人团聚或祭祖的习俗,但苏轼却寻找借口自娱山水之间,数着水中的鱼,听着山间的鸟鸣,透露着一种可爱顽皮的情趣。《夜泛西湖五绝》是苏轼于熙宁五年(1072)初夏的一个月夜游览西湖写成的。苏轼夜游不是为了赏月,而是为了观看一种奇特的“湖光”：“湖光非鬼亦非仙,风恬浪静光满川。须臾两两入寺去,就视不见空茫然。”(其五)据周密《癸辛杂识》记载:“西湖四圣观前,每至昏后,有一灯浮水上。其色青红,自施食亭南至西泠桥复回。风雨中,光愈盛,月明则稍淡,雷电之时,则与电争光闪烁。余之所居,在积庆山巅,每夕观之无少差,凡有二十年矣。”一个对生活有情趣的人才会如此彻夜不眠地去探奇寻异,保持着天真的心态。再看《钱江观秋潮》:“海上涛头一线来,楼前指顾雪成堆。从今潮上君须上,更看银山二十回。”可谓豪兴万丈,欣赏海潮的乐趣难以言表。

苏轼在杭州曾多次赏牡丹品梅花。熙宁五年(1072)三月二十三日,苏轼应太守沈立之邀,到吉祥寺僧守璘的花圃观赏牡丹花。兴之所至,沈立倡议众人头插牡丹从吉祥寺出发夜游,苏轼自然也在其中:“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醉归扶路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吉祥寺赏牡丹》)往日严肃的官员忘形嬉闹,引得市民争相观赏。苏轼还写了不少咏梅诗,据统计,仅写给通判杨公济的咏梅绝句就有二十首之多。“他年欲识吴姬面,秉烛三更对此花”(《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之十》),赏梅兴致之高表露无疑。

西湖骤雨也能让苏轼产生极大的兴趣,《望湖楼醉书》就捕捉了瞬息万变的大自然景象:“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后来,他又在吴山有美堂

观赏钱塘江上的暴雨,以丰富的想象写下了《有美堂暴雨》一诗。苏轼就是这样一位兴致勃然的诗人,他能从普普通通的雨水中发现它的奇特变幻。《饮湖上初晴后雨》更是诗人鉴赏西湖留下的最灵动的诗篇。

走向自然是为了舒展个性、安顿心灵的需要。苏轼自称“推挤不去已三年,鱼鸟依然笑我顽。人未放归江北路,天教看尽浙西山”;“人生此乐须天付,莫遣儿郎取次知”(《与毛令、方尉游西菩寺二首》)。杭州这块土地使苏轼原本旷朗的性情与外界的景物得到了即心、即景、即情的融汇,他忘却了个人的得失,感受到一种享受自由、无拘无束、无牵无挂的轻松惬意,内心平静恬适。

2 吟诗赋词是艺术的生存方式。苏轼是一位视艺术为生命的天才诗人,他把生命融入到了诗歌、绘画、书法当中。苏轼自称在杭州写过一千首诗篇,可以说,他在诗歌中找到了自己的生命依托。

熙宁四年冬,苏轼抵杭州任。一接触到杭州的自然山水,他便乐而忘忧,发出了自由而逍遥的歌唱,从心里流出美妙的韵律。记游的《行香子》(“一叶轻舟”)写浙江桐庐七里瀨“重重似画,曲曲如屏”的景色;观潮的《瑞鹧鸪》(“碧山影里小红旗”)写钱塘弄潮儿搏击江潮的习俗;《虞美人·有美堂赠述古》写“夜阑风静欲归时,惟有一江明月碧琉璃”的清丽景象。仕途失意的苏轼在公务之余亲近自然,万千景象怡悦情性,也为他的创作带来了丰富的题材,使他悠游于艺术当中。

苏诗陶写胸次,寄托情怀。如《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之二:“凜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写树亦写人,写人亦写己之胸襟。另如《西湖寿星院此君轩》以君子喻竹,君子的形象、节操与“苍苍立玉身”的竹子合而为一。再如《赠刘景文》:“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残菊傲立霜枝,风骨犹存,令人尊敬。对桧、竹、菊的精神、品质和气节的赞美,体现了苏轼的人格境界,他用艺术传达出自己对节操的追求。

苏轼在杭时期诗歌创作的数量是各个时期中最多的,题材也十分广泛。吟诗赋词成为苏轼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生命的自然流露,也是一种艺术的生存方式。用雅致灵秀的诗词写山容水

态、人物风姿、情怀心绪,这何尝不是对美的生活的追求!清人叶燮在其《原诗·外篇》中指出:“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王小舒先生也认为:“说到底,文学的状况就是人自身的状况,文学与人的关系构成了人在世界中的基本活法。”^{[4]19}诗歌是诗人内在情感的流露和倾诉,是心理的真实存在。苏轼在杭时期的诗歌创作,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观照苏轼的心境,它既是遣怀的需要,也是精神支撑的需要。我们看到的是诗人真正的处世态度,他把心放在自然之中,从山水中发现愉悦自身的美。不言而喻,具有真性情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诗人。苏轼不强作好诗,一切皆在情之所至,从而达到自得之乐,自娱其情。

3 结交僧侣是心灵的契合。苏轼平生喜欢庙宇,崇敬和尚。他的弟弟苏辙说他在杭州时,“三百六十寺,处处题清诗”,并非夸张之辞。

苏轼第一次来杭,三天后就去孤山拜访惠勤、惠思二僧。惠勤、惠思隐于清幽“孤绝”之地,过着清苦的生活,却能深得淡泊之趣,让苏轼羡慕不已,他用“道人有道山不孤”的诗句称美他们。

苏轼做通判时,常与佛印、常同游寺庙,两人巧思妙语,智慧超群。苏轼对天竺寺的高僧辩才十分仰慕,与之多有来往。辩才禅师自天竺归老于龙井后,自言不复出入。元祐五年十月的一天,苏轼去龙井拜访他,辩才不知不觉送苏轼过了归隐桥,破了送客的戒规。辩才对苏轼道:“杜子美有云:‘与子成二老,来往亦风流’,尔我之谓也。”苏轼以诗记录了他们的相会:“我比陶令愧,师为远公优。送我还过溪,溪水当逆流。聊使此山人,永记二老游。大千在掌握,宁有离别忧。”以陶渊明为人生楷模的苏轼,公务之余来拜望辩才,两人品茗悟道,精神契合,即便分手也无离别之忧,因为大千世界掌握在手,表达了达其观超旷的襟怀。

与苏轼缘分最深的当是诗僧参寥。参寥名道潜,於潜浮溪村人。元祐六年,参寥在孤山智果寺得泉水,采新茶,款待苏轼;苏轼忽然回忆起九年前在黄州梦见参寥作诗,悟得“寒食清明都过了,石泉槐火一时新”两句诗的意思,令在座之人感叹不已,顿生情趣,“参寥泉”因此得名。梦境与生活相吻合,实乃新奇之事,而苏轼居然还记得黄州梦境,的确是生活的有心人。

苏轼在与僧人的交往中,达到了心灵的交互,精神的契合。他“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于潜僧绿筠轩》),对清新简单的生活无比赞美。在游灵隐时他甚至认为,能够躺在清静的僧房里睡一会午觉,有香烟清风,便是“遂超羲皇傲几蘧”(《游灵隐寺得来诗复用前韵》)了。

佛教是静心的,也是温情的。朱光潜先生就曾说过:“佛教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业。”因此,苏轼喜欢结交僧侣并不妨碍他实现安民济世的政治理想;而公务之余,在与僧人的交往中感悟佛学中的智慧,则能使他不胶着于世务,释放烦恼,颐养心灵,达于超然无累的境地。

三、获取圆满自足的人生智慧

苏轼两度来杭,都是从朝廷做官到外任地方官。在杭期间,他既保持了强烈的淑世态度,又优游于自然之中,与僧侣为友,与艺术神交,能“入”能“出”,舒卷自如,始终充满着自由的精神和快乐的情绪,向我们展示了一种融会多元思想的生命特征。

在《宋史》苏轼的传记中,开端就记载了他早年时的两则故事。一则是说当他10岁时,母亲程氏教他读《范滂传》,他就要学范滂,愿以天下为己任,不避艰危;另一则是说他长大之后读《庄子》“得吾心矣”,对顺应自然的庄子哲学心领神会。苏轼记载,苏轼“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可见,在他的身上,有着多种文化的交融,儒、释、道都积淀于心。正如王小舒先生所说:“一个精神世界极为丰富、主体创造力极强的人,必然会、也一定能够熔铸各种思想材料,化为己有,就像体魄强健之人具有很强的肠胃道消化能力一样。”^{[4] 75}

儒、佛、道三者不同,却又有相通之处。“儒家以入世进取为基本精神,又以‘达兼穷独’‘用行舍藏’作为必要的补充;佛家出世、道家遁世的基本精神,则又与儒家的‘穷独’相通。苏轼对此三者,染濡均深,却又融会贯通,兼采并用,形成自己的鲜明特征。”^{[1] 301-302}苏轼自己也说:“余以为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之言,皆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庄子祠堂记》)。“孔老异

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相攻。我见大海,有北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祭龙井辩才文》)。苏轼的主体意识极强,包容性极大。他从生活的需要而不是从纯思辨的角度去对待各派学说,对不同的文化采取了相融的态度,以儒修身正心,以释、道静心养心,因此,也就有了圆通、灵活的生活方式。

在杭期间的苏轼,人生是积极的,生活是充实而丰富的。一方面,他秉承着儒家的思想,执著于实践,兴修水利,赈灾安民。因为,“孔、孟所奉行的是以实际行为来完成自身的道德修养,并以实际行为来实现其政治理想。他们的哲学是属于人间的,是脚踏实地的,是不离开日用人伦的”。^[9]为民办好事是苏轼平生的重要抱负,他总是尽心尽力(“余以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不憾”(《墨妙亭记》),追求的是圣贤的德性之乐、理义之乐。“《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礼记·大学》)君子得人生之真乐,能与天下万民同享快乐,民乐即同我乐,民忧有如我忧。爱民如子者,才不愧为万民之父母。作为一个士大夫,苏轼首先追求的是以众乐之乐为乐,这是人生的大乐;另一方面,他又从道、释两家吸取营养,用一种审美的态度,悦乐山水,体悟人生,获得感官的快乐。释放与宁心的快乐虽是一己的小乐,却表达了对生命的尊重。苏轼对儒家思想的坚持是主体;而对佛道思想的吸收则是为我所用,辅助他处置人生的忧患,消解痛苦。因此,他并没有让道、释的出世思想影响自己的入世情怀,而是取其静以养心的态度,顺应自然的观念,以保持达观的处世态度,保持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执著和追求,从而释放出一种人格的魅力。

再从杭州温润的气候、秀美的山水来看,它们本身就有着一种极强的亲和力,能够由外在向个体内化,增强人们对生命与自然合而为一的内在感知,熨帖人的情绪;加之佛、道思想的浸染,崇尚“性之便、意之适”(《雪堂问潘邠老》)的精神境界、个体的内在修养,都使苏轼在心理机制上具有了一种向外的投射。对山水认同、在自然中得到契合、超脱利害、返归自然,使苏轼达到了物我一体、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说

过一句经典的话：“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人生不免曲折艰辛，有阳光、溪流、鲜花、星辰的自然明澈清纯，令人神往。苏轼遭遇了仕途的曲折，但他热爱自然，喜好领略湖山之美，“西湖亦何有，万象生我目”（《连日与王忠玉张全翁游西湖访北山清顺道潜二》），所以，他在自然中歌唱，在生活中吟咏，吟诗赋词构成了他的一种生活方式。“苏轼作品的动人之处，在于展现了可供人们感知、思索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表达了他深邃精微的人生体验和思考。”^{[1][30]}苏轼最理解快乐的真义，实践道德、吟赏风月、陶写性情都体现了他对生命的珍视，圣贤之乐与世俗之乐在他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统一。

苏轼把儒家用世的志意、佛道淡定旷观的精神进行了完满的融合，铸成了自身圆满自足的精神世界。毋庸置疑，苏轼是一个尽管有外放做官的流转失意，“也未尝迷失彷徨，而终于完成了一己的人生之目标与持守的成功的人物”。^[6]他坚守严肃，具有君子的人格，又平添了一份潇洒，因而更具一种常人心态，洋溢着生命的活力。正如孔子所言：“君子其未得也，则乐其意；既已得之又乐其治。是以有终身之乐，无一日之忧。”（《荀子·修身》）

苏轼以他过人的睿智熔铸了儒释道的思想，以天下为己任的“用世之志意”深入骨髓，始终执着，又在困苦与忧患的时候用释道解惑，避开纷争，淡化并超越世俗的功利。入世之志意与超旷之襟怀，成了苏轼人生的一体两翼，平衡着他的心灵，使他领悟了生活的真谛，能够自由舒展个体生命，圆融地面对一切。苏轼的生命始终是积极快乐的，达到了一种生机浩荡、天趣洋溢、超然旷观、自足完满的人生境界。苏轼杭州时期的个体精神和文化性格，为我们树立了一种融入于世又超然世外的人格典范。

参考文献：

- [1] 王水照. 王水照自选集[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 [2] 桂栖鹏，侯雷. 苏轼在湖州[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4(5)：83-86.
- [3] 刘斌元. 诗意地栖居——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生活理想[J]. 美与时代，2009(2)：12.
- [4] 王小舒. 中国文学精神：宋元卷[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
- [5] 莫砺锋. 论杜甫的文化意义[J]. 杜甫研究学刊，2000(4)：11-18.
- [6] 叶嘉莹. 唐宋词名家论稿[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118.

Cultural Disposition of Su Shi as Judged by His Stays in Hangzhou

ZHOU Xiaoyin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Law, Hangzhou Polytechnic College, Hangzhou 310012, China)

Abstract Su Shi (1037—1101) was twice relegated and exiled to Hangzhou in his political career. Frustrated as he was, he persisted in doing things for the local people and accomplishing his own moral cultivation through his administrative practice, thereby realizing his political ideals. An active optimist, he took to sightseeing, composing poems and making friends with monks, and achieved the perfect union between the natural and the human environments of Hangzhou. Such a life philosophy of his, characterized by great vitality, overflowed humor, open-mindedness and self-contentment, was derived from his adherence to Confucianism as well as his incorporation of Buddhism. The determination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activities and the broad-mindedness in standing aloof from worldly affairs constituted the dual nature of his life, which manifested his true respect for individual lives and showed a cultural disposition that can be acquired.

Key words Su Shi; Hangzhou; open-mindedness;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cultural disposition

(责任编辑 吴波)